

東南亞華人文化調適的研究思路

時間：108年10月30日(三)14:00-16:00
地點：科技部2樓第13會議室
主講人：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副校長)
主持人：高嘉謙(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記錄：南向華語與文化傳釋計畫團隊

本次由國立臺灣大學「南向華語與文化傳釋」計畫推動的 Nusantara 南方人文沙龍系列講座，邀請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副校長兼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安煥然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誰是華人：東南亞華人文化調適的研究思路」。安教授長期從事東南亞歷史、馬來西亞華人史及華人研究，他在講座中總結歷來學界針對東南亞華人研究議題的方向與成果，並以馬來西亞研究者的身分，列舉在地經驗和生活化的例子，說明東南亞華人文化調適的歷程。

一、東南亞華人文化的研究視角與方向

「華人」一詞，泛指在中國境外，散布於世界各地的華裔，而不同的稱呼諸如華人、華僑、華裔、海外華人、Chinese overseas、Overseas Chinese 等，皆指出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複雜性。其中東南亞華人的研究議題，始終位處邊緣，或僅是配角。大陸學界在觸及海外華人議題時，常偏向以「中華文化在東南亞(或「海外」)的傳播與影響」的單一視角，儼然以自身為中心，探勘「外部」的華人文化。因此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往往被視為是從中國文化母體延伸出去的文化而已。相較之下，臺灣學界較認可華人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傾向於比較東南亞、臺灣與中國大陸等地區，尋找文化上的差異，並回探自己的存在(或是自身文化中的「進步」性與自主性)，尤以臺灣客家學和媽祖研究為主。然近年盛行的「華語語系」視角則反轉這兩種觀點，轉而提倡「在地性」與「文化自主性」，強調當地華人的主體性。

安教授從文化變遷的角度指出，研究華人文化不能片面地以中國或臺灣為主，而是要回到不同地域特殊的情境。特別是戰後東南亞各地的政局和社會劇變，華人在當地社會的文化扎根歷程，反映其文化調適已經不只是中國文化的延伸，而是立基於本土關懷，自覺的對華人傳統文化本土化再建構的過程。因此學界對戰後東南亞華人的研究，不能僅從「文化差異」或是華人傳統「情濃」的「文化延續」，抑或本土化「必然」的「文化融合」等方向簡單概括，而需要對當地的歷史脈絡和本土語境有基本的認知。循此，研究必須將歷史時空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與世界文化網絡的流通，以及在某種特定時空中對原生情感的召喚、集體記憶的構塑等重要因素納入考量。安教授認為，忽略以上的因素，華人研究恐怕只是隔靴搔癢。



圖一：安煥然教授分享他與臺灣結緣的經過，牽引出兩地的跨國連結

二、華人文化的本土化 (localization)

當「華人」這一身分認同各有所指，安教授指出，我們應當了解的不是「誰是華人」，而是「為什麼說自己是華人」。這牽涉的是華人置身其中的「情境」問題。舉例來說，離散／散居的海外華人 (Chinese diaspora)、「海外寓居華人」和「海外本土華人」、「華僑」、「中華膠」等稱呼，反映華人社群的歧異性。而移居海外的華人會因應各地不同的社會環境，經歷本土化的過程。大致上本土化可分為兩種，即同化 (assimilation) 與涵化 (acculturation)。涵化僅是文化本土化之變遷，即華人仍然自認為華人，儘管他們的某些文化已經本土化，像是 15 世

紀初開始定居東南亞一帶的峇峇；同化則涉及族群認同的轉變，即不再認為自身是華人。

安教授引用陳志明的說法，指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承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不斷的變遷中傳承，這是一般文化傳承的規律。因此華人本土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的變遷、本土化與認同、文化交流和群體關係等。中華文化一方面受到華人內部不同方言群因文化互動的綜合影響，同時也受到當地文化和環境的影響。但是本土化的過程並非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文化傳承，不僅汲取一些當地的素材進行創造，產生屬於自身獨特的文化，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當地文化。涵化的文化交流有創造與再創造的過程，而那些經過本土化成為華人文化的一部分的文化特徵，尤其反映在語言與飲食習慣上。以語言來說，新馬的福建話（閩南話）就有許多馬來語借詞，像是「交寅」（kahwin，結婚）、「三萬」（saman，傳票）、「巴剎」（pasar，菜市場）等。安教授進一步指出，根據北京大學孔遠志教授的統計，儘管漢語中有馬來語借詞，馬來語中有漢語借詞，但前者還不如後者多。馬來語中的漢語借詞至少有一千多個詞彙（馬來西亞「官方」說法是五百多），其中借自閩南方言的占了近 90%，這正是雙方文化互相借鑑、相互影響的證明。有趣的是，這當中最為人熟知的借詞多跟食物有關，像是「pau」（包子）、「bacang」（肉粽）、「tahu」（豆腐）等。

三、「華人」的多重認同身分

儘管馬來西亞華人在飲食習慣和語言上跟在地文化交融而產生涵化的文化現象，但不一定會改變其族群認同。一個族群的認同意識，其認同的邊界和對象往往基於客觀環境和在地的特殊內部複雜因素，不僅會隨著社會改變，也是因實際狀況和社群心理上的認同與想像所致。因此族群認同非常多元，其指向的位置不同，認同的對象也就不同，而且其認同的文化象徵也是多元的，甚至帶有某種程度的想像和虛擬。概言之，早期的新馬華人社會有峇峇和新客之分；其後，由於華人接受不同的教育源流，又有英校生和華校生之分；而今，華社則有國中生和獨中生之分。儘管華人社群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認知都各有不同，但其中仍有共通之處。

進一步說，馬來西亞華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條件下，依據姓氏、語言、出生地、國家等各方面的特點來定義自身的身分。因此他可以自我認定為安姓人、華人、新山人、馬來西亞華人、馬來西亞人等。同時在華人社會內部的次族群中，又有祖籍認同和方言群認同的交叉重疊，如「五幫」：潮州、福建、廣肇、

客家、海南（瓊幫）等幫群分類的社會結構。因此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認同並非只限於「中國」或「在地」，而是多元和混雜的。質言之，「馬來西亞華人」若被當成一個「族群」來理解，它理應視為是一個「建構中」的過程，其中一再強調的「華人文化」，也是一個建構中的產物。



圖二：安煥然教授介紹同屬南島語族的馬來半島原住民塞邁族（Semai）的傳統樂器——鼻笛，而臺灣的排灣族（Paiwan）也有相似的雙管鼻笛

四、由「文化傳承」到「文化建構」

戰後東南亞各地的現代化及強調同質性的民族國家的建立，直接促成華人認同和文化產生劇變，文化融合成為必然的趨勢。在這樣的情況下，東南亞華人要如何在文化傳承與變遷之間取得平衡成為共通的難題。重要的是，「華人性」文化認同意識與社會整合的程度，融合抑或衝突，其實很大程度取決於東南亞華人面對的國家政權和社會情境。相對於印尼的排華政策，馬來西亞政府通過頒布諸多不平等的政策，剝奪華人的權益，藉此提升當地土著與馬來人的地位和經濟利益。不管是新經濟政策或是固打制的推行，都是為了優先保障土著和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和特殊權益，因此華人雖然有法律上的公民身分，卻未享有應得的權利。安教授就以南方大學學院每年發行的商品為例，說明華人的民辦學府必須倚靠華社的資金推動教育事業，反映馬來西亞華人的困境。

除了政經層面的剝削外，官方語言和國家文化也以馬來文化為正宗，邊緣化其他族裔既有的文化和語言。在這樣的背景上，安教授認為我們才能理解為

何馬來西亞華人會有很強的文化認同。他以林開忠的說法指出，「馬華文化」是一個「建構中」的文化，是回應國家文化而「創造」出來的產物。確切的說，馬來西亞不平等的政經結構，引發當地華人的焦慮，在華商和菁英分子的推動下，透過華人文化運動產生特殊的華人文化傳統。於是華團與公會積極再創造許多文化活動，以凝聚當地華人。安教授更為此在現場演唱一曲〈傳燈〉，讓眾人感受當時華團為了傳播自身文化，守護文化根源的艱辛與血淚。

其中，華人文化節更成為馬華社會每年一度的文化盛典，由各州華團輪值主辦，其宗旨是希望通過「文化過節」的方式，讓馬華文化的建設也能夠豐富「國家文化」的內涵，同時也是一個強化華人社會資源整合與文化醒覺的群眾運動。此外安教授列舉二十四節令鼓、柔佛古廟游神、中秋園遊會等例子，說明這些華人文化和節慶都是由馬來西亞華人創造出來的一種表演文化。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東南亞華人因族群關係而有複雜的文化情意結，同時還要面對政治經濟、階級、公平與正義、人權意識等等的問題糾葛。然而安教授認為，這樣的一套文化論述，實際上受到國族文化論述的牽制，只能成為複製品。重要的是，在國家政權的干預下，這些華人文化傳統的內涵和表現方式都是由當地的華商和菁英分子推崇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因此華人文化的再發明和創造，也有其局限性。

五、「中國視角」還是「本土視角」：研究思路的調整

安煥然教授接著從歷史學的研究視角指出，華人文化的延續與變遷同時受到內部及外部力量的影響。內部力量包括華人社會內部的次社群的整合與衝突，而外部力量則來自中國、當地政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政策，以及世界的局勢變化等。換言之，東南亞華人文化固然受到本土化的影響必須進行文化調適，但也是對於外部壓力和刺激做出的回應。因此針對東南亞華人文化社會的研究，必須回到「歷史現場」，把握具體的歷史脈絡，將探討的主題放置於不同時段和地區的特殊歷史情境中進行考察，才能清楚探析其變遷的脈絡和特色。

作為東南亞華人史的研究者，安教授指出學界常見的「中國視角」和「本土視角」兩種研究取向的主要觀點和局限。他認為以中國視角進行研究，往往會忽略對東南亞「本土」主體性社會脈絡的觀察，而抱持中心（中國）與邊緣（東南亞）的傳統「天朝」觀念，一廂情願認為海外華人的文化建構只是中國文化的延伸，其研究必然會失焦和產生誤讀。90年代，中國學界以中國中心的視角研究馬華文學的論述方向，引起馬華新銳作家激烈的抨擊，而「黃錦樹現象」引發的

「燒芭」和「斷奶」論，是馬華文壇思潮嬗變、範式轉換和話語權力遷移的某種聚焦性表徵。因此他認為以「中國視角」研究東南亞華人問題的學者，應認清中國境外的華人社會已經有其融合自主的文化，無法被普遍化為一種中國文化的共識，因而他們探究「差異」的比較研究，需要具備一份「同理心」。

相對的「本土視角」強調從「當地人」的觀點看待問題。以新馬華人文化的本土化進程而言，它是在華人固有文化和當地脈絡上產生的，經歷了「馬來西亞化」或「在地化」的階段。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不全然是融合，也包括抗爭、對話的再建構歷程。其中本土派學者廖建裕認為，華人文化屬性雖然部分來自中國，有其歷史淵源，但它已不斷變形。而中國文化也在變遷，跟華人所認識或保有的中華文化已經有很不同的內涵與發展。即使東南亞華人在文化認同上，承認中國是華人的文化母體，但與中國之間存在一種斷裂的關聯和距離感。廖主張中國不是海外華人的保護者，他們的外交行為和對華政策重視的是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等國家利益。廖建裕認為當前更重要的現實問題是，究竟東南亞華人如何看待當代中國的崛起？對「一帶一路」及所謂世界華人生命共同體的建構，他們到底抱持怎樣的態度？東南亞華人會因此同感榮耀還是憂慮不安？是否重新浮現中國理想？確定的是，東南亞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內部對這「中國」、香港、臺灣問題，是嚴重「撕裂」的立場。安教授認為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六、對話的意義：華人的文化調適

不論是以何種立場看待東南亞華人問題，安教授認為必須要在「世界史」的宏觀視野上，把握東南亞的有機結構切入當地華人的問題。安教授以戴國輝為例，認為他以「同理心」面對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現實狀況，並以人道主義的立場，撰文提醒日本學界不應與東南亞的狹隘種族主義、極端國家主義和盲目的愛國主義者等為伍，成為東南亞政治權謀者的幫兇，陷華人於不義。同時，關注殖民地統治和被壓制民族問題的戴國輝，指出東南亞國家不應強迫性同化華人或採取統合政策，而應將華人視為少數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塑造新興國形象。因此他強調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必須把問題放置在當地的歷史脈絡和具體的政經文教結構，重新審視和描繪華社真實的樣貌。安教授認為戴國輝一方面指出結構性問題，而其「以邊陲射向中心」的研究路徑，更是準確捕抓到華人之所以耗盡心力捍衛自己的民族性，根本原因在於他們處於邊陲地位，在當地面對人種或民族差別對待及疏離的狀態。

重要的是，安教授藉由戴國輝的研究思路，指出這樣一個事實：那些長期自以為是，「習慣」自我中心主義的主流社群，難以明白這個道理。然而多語言的背景和跨文化的經驗，卻能讓我們擺脫封閉單一的思維，以平等開放的態度對待別人。因此他認為臺灣新南向政策的推行，有助於知識和文化的跨國對話，透過人才的交流和資源的共享，創造互利共贏的局面。